

求索中國

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 著

1956-1966

中共党史出版社



CHAPTER 7

第七章 跌入谷底

1 危机潜行 饥馑已浸中国 继续跃进 狂飙再起神州

饥馑已逼近中国老百姓

1959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颤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个人都要吃……”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这窝头与河南吃的烤面包真是天地之差。

我想起了马维带来的那个窝头，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

毛泽东独自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抽动着，有些壅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他哭了。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相信，他想到的决不止是农民受了苦，他一定还想到了河南吃的烤面包，在铁路旁的村子里吃的红烧肉，想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想到了他的美好理想与严酷的现实……

李银桥说的马维从家乡带来的那个使毛泽东落泪的窝头，是在1957年秋。两年过去了，老百姓吃的仍然是无法下咽的窝头。毛泽东心事沉重。

不过，毛泽东还不知道，这时老百姓受的苦与1957年不可同日而语。他更难相信，这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尤其是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带来的严重后果。充其量，他认为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气可鼓不可泄，只要动员全国人民忍受暂时的困难。鼓足干劲继续“大跃进”，就能摆脱困境。战争年代，多少困境不都是这样挺过去了吗？

毛泽东说：

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读书笔记）

刘少奇也说：

农民说得好：“几年辛苦，万年幸福。”

如果群众觉悟提高，群众会说：宁愿少吃一点，多积累，多生产一些。那么速度就快了。积累多少？只要群众谅解，可以多积累。（1959年11月13日讲话）

暂且不说“几年辛苦，万年幸福”的口号是否代表了农民的心声，那个年代什么口号都会制造出来。问题是这时，在许多农村，“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这两条都保不住了，不是“少吃”，而是“没吃”，情况比领导人想象的严重得多。1959年～1960年冬春，饥馑已经逼近中国的老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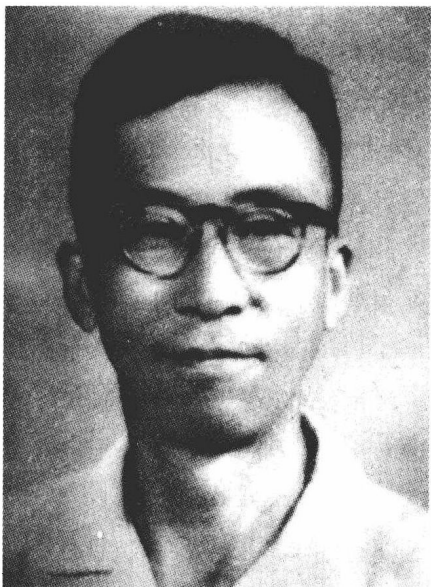
顾准日记：一个落难思想者的实录

从留下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很难了解当时发生在农村的灾情。从各省市报来的

情况,从每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消息,形势一片大好。

幸亏,我们有《顾准日记》。

顾准,一个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原是学部经济所的经济学家。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在这里,他时断时续地写下了一本“商城日记”。^①他本来是不让别人看的。在当时,如果真的示之于人,那于作者,只能是“罪上加罪”。正因为不打算示人,也就去掉了粉饰、矫情、造假的苦恼,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实录。



顾准

右派下放监督劳动,本来着重于思想改造,然而,这时,顾准首先接受的是饥饿的煎熬。正因为这样,顾准花了不少笔墨来记自己如何想办法搞东西吃。一条胡萝卜,成了“宝中之宝”。有几次他吃饱了,就高兴得大写“痛快之至”。其实那个时候,不少人都已到了生物本能的极限,按照生物本能活着。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饭,加一盆红薯叶,居然吃完。饥饿是可怕的。(1959年11月21日)

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陆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一点红薯与胡萝卜吃。(1959年12月15日)

劳动队的肿病一下子在一个月內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1959年12月17日)

为了果腹,他也去偷吃萝卜,他自问:“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1960年1月16日)

劳动队虽然艰苦,但跟农村人民公社比起来,“劳动队还是天堂”,(1959年12

^① 《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月 27 日) 顾准日记中不时出现农村灾民的形象和饿死人的消息。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 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 营养不良。缝纫室的哥嫂同时死亡, 也是肿病。1959 年旱灾, 1960 年春夏, 说还有多少人死亡呢? (1959 年 11 月 4 日)

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从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二顿稀饭, 欢喜得不得了。徐从周是在避难所里。我对他说, 现若他仍在农村, 目击心伤, 如何过去? (1959 年 11 月 4 日)

刨红薯, 民工过路, 歆慕不已, 都到地头捡残屑, 驱之不去。一个新发明, 红薯藤磨粉。(1959 后 11 月 13 日)

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之女、刘文惠之父。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1959 年 11 月 27 日)

附近路倒尸二起。黄渤家中……十五人中死了五个。(1959 年 12 月 17 日)

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 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 张保修家死了人。(1959 年 11 月 30 日)

“饥饿——浮肿——死亡”的规律无法逃遁。饥馑正在农村肆虐。

《顾准日记》记录的实情, 与决策者的估计, 与公开的宣传, 差距何其大也! 假如最高层了解真情, 会作何处置? 假如不堵塞言路, 路人皆知的灾情, 能不上达吗?

毛泽东再次倡导全党读书

这时, 毛泽东又向全党高级干部发出倡导读书, 指定的书目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 年 1 月第三版)。

早在 1958 年冬, 毛泽东就倡导读书。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如火如荼, 毛泽东在为“九个指头”的成就而欣喜的同时, 也发现了属于“一个指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他多次倡导读书, 希望通过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1959 年 6 月初上庐山时, 毛泽东最初拟定的议程, 第一项任务就是读书, 他说: “不要整年整月事务主义, 搞得很忙乱, 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后来, 形势突变,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 毛泽东号召读书的事也就被搁置一边了。

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为了回答国内外的怀疑, 也为

了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一套做法寻求理论上的支持，毛泽东再次倡导读书。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分歧，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全党读这本书呢？他曾经这样回答：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成系统的东西还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外，只有这本书。他说：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196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建议：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政治经济学的小组，先读这本书的下半部，五一节以后读上半部，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你不读，我们也不了解苏联，不了解他讲些什么事情，同时我们要写教科书，也没有比较。”

毛泽东本人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三地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批“秀才”。

在这之前，1959年11月2日至22日，已有刘少奇在海南崖县（今三亚）组织了读书小组。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以及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书记林学明等参加读书小组。在这之后，周恩来于1960年2月13日至3月2日在广东从化组织了自己的读书会。参加的人员有李富春、陶铸、宋任穷、吴芝圃、胡绳、许涤新、薛暮桥、王鹤寿、吕正操、陈正人等人。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边读边议，议论风生，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审视苏联教科书，发表了许多意见。参加读书的同志将这些谈话，整理成笔记，保存下来两种本子：一种是把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归纳，加上小标题，一共列出13个问题。冠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种是按章节顺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标题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这两份笔记为今天的人们记录下了当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脉络。

毛泽东在这时，花上三个月时间坐下来读书，可见他对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急切愿望，其中不乏有见地的思想。然而，这时，他的主导倾向是要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这三件东西毛泽东视为至宝。但在国内外都遇到了非难，国内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进攻”，国外有赫鲁晓夫的指责、杜勒斯的讥讽、尼赫鲁的乘人之危。毛泽东发誓，这三个东西，要向全世界宣战：他要用实践来回击国内外的挑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分歧的加深，也使毛泽东更多地着眼于“批判”而不是借鉴。

急于写出自己的教科书。批判的武器是中国的经验。当时，中国只有十年的建设经验，前七年基本上是搬苏联，谈不上独创。1956年的认识和八大路线，毛泽东自己已经不重视。剩下来的只有三年“大跃进”的一套做法。今天来阅读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他对1958年以来的路线的自信和维持。读书并没有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我们就要这样干：‘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中国能不能大跃进？大跃进能不能持续下去？

毛泽东的回答是：能！他说：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

法国《快报》评论中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

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对我们1959年新闻公报，《纽约时报》的评论说：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有四条：一、中国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苏联那时没有这种帮助，它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国的合作化搞得快，没有造成损失；三、中国的劳动力多，而且用人民公社这种“集中营”的方法组织起来了，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多，而且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下高度地组织起来了；四、中国是后进的国家，可以接受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一切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优越条件。这个评论比较客观，看起来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上他们。日本这样小的

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

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

这里，毛泽东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可以“大跃进”的根据，他对于国外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这句话尤其欣赏。对于外论中把人民公社组织形式比之为“集中营”并无愠色，反而称“这个评论比较客观”。他急切地希望中国“进步”。改变“被人看不起”的地位。”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开足马力奋勇前进’”。他预言“经过58～59年大跃进，60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这时，全党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继续“大跃进”的“气”早已鼓起。各地的报告“形势喜人”。有的人甚至认为，如果早反右倾，困难就不会出现。《人民日报》浮夸虚幻之声不绝于耳。每天都有醒目的标题：“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实现大跃进”、“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大搞副业”、“大搞深翻”、“大办文教卫生”、“高速万岁”。接近岁末，又见丰收喜讯纷呈：欢呼《奇迹！奇迹！》。

毛泽东接过卫士从农村带来的馊窝头时的抑郁心情，已烟消云散，他又为全国的跃进形势而精神亢奋。

中共中央已经提出1960年经济建设总方针：“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要争取1960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60年代》，宣布已经实现了提前3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号召。说：“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1月2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单看标题，就已感到了“大跃进”的热浪袭人。

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1月9日，毛泽东再次向与会者发问：“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他说：“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的大跃进），是有理由的。你没有东西，他怎么能够相信呢？”“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1月23日，毛泽东又将一个文件批给其他领导人，他重重地批道：“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

上海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产钢1840万吨，产粮6000亿斤。会上还讨论了二五计划后三年设想和未来八年的初步设想。

三年设想是，提前五年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五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五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

八年总要求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工农业生产不断跃进，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同时，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中要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

这个三年、八年设想体现的，依然是要尽可能地赶上和超过美国，早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领导人脑子里，充满着急于求成，急求过渡的思想。

上海会议后，各地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各种“大办”，一轰而起。3~4月召开的二届二次人大会议通过了1960年的“大跃进”计划。

周恩来对这种势头心有疑虑。年初，他在从化读书时委婉地提出：“今年又有‘左’的苗头”。“总不能天天跃进，总有波浪。”然而，在“大跃进”热浪再度席卷而来之时，周恩来的这种声音显得多么微弱。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准备条件过渡”

从1958年起，“大跃进”总是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大跃进”速度放慢些，过渡的安排也推后一些；“大跃进”再度强调时，过渡问题重又成为当务之急。

庐山会议后，全党再次发动“大跃进”，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自然成了毛泽东乃至全党关注的焦点之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读书笔记都以很大篇幅，饶有兴趣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阶段，应当有两个过渡。毛泽东进而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再在物质产品、精神财富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他又认为，在这两个阶段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所有制逐步发展的问题，即先由目前的基本队有制发展到基本社有制，再由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发展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此后，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两个阶段的观点和多次过渡的观点，是一个有意义的思考，它对于径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客观上起到一定节制作用。阶段多了，时间也就自然延长了。

然而，毛泽东接下来又提出：当前面临的，是如何与继续“大跃进”相适应，来实现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又把过渡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中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提法特别反感。他说：“彻底巩固”四个字看了不舒服。社会主义制度要巩固，但不能强调过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刘少奇也说：“‘大力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对列宁的一段经典论断“国家愈落后，过渡愈困难”，表示异议。他说：“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

谈到过渡的条件，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转变到基本社有制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我们将来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主要的步骤，将是在社有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社有经济占到全社经济的一半以上，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了。”“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那时，“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再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进而转变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

这里，毛泽东似乎强调了过渡的条件。然而，第一，基本取向还是要创造条件“过渡”，第二，这个条件说是不搞“一平二调”，而是发展社有经济。愿望或许很好，但事实上在当时强调发展社有经济，除了“空手套白狼”，平调生产队的人力和财物，便无从做起。

刘少奇在海南读书时也说：

应该在社会主义阶段做好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准备，否则到那时过渡不了——这些准备是：“物产极丰富、生产力高度发展，道德水平大大提高，人们不计较报酬，积极生产，三个差别消灭，按需分配，否则过渡不了。”

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有些能够满足。先从衣食的需要开始。让人们先满足吃、穿的需要，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什么东西（例如手表就不是一下子就能满足了的）。也可以半供给、半发工资。

“按劳分配”万岁，是难以走到共产主义的。

从现在起就要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好条件，这个思想与毛泽东是相同的。当然，刘少奇也讲了另一面。他说，“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刮‘共产风’的例子就是，会破坏生产力的）”然而，接下来，他话风一转，又自我否定了：“今天我国的生产关系是跑到生产力的前头了吗？还是相适应的？是相适应的，不能说生产关系跑到前头了。”“它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但物质基础有些不够。”这些话让人听起来，有模棱两可的感觉。

共产主义的情结支配着一代领导人的思想。

循着上述思路，1959年12月举行的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了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问题。在此之前，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会议提出过分配给社员每人200元左右的过渡条件。座谈会同意这个条件，并认为，要每人分到200元，人民公社的总产值每人平均一般要达到600元到800元。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江苏全省人民公社总产值要在1959年56亿元的基础上提高三四倍，安徽要在1959年57.36亿元的基础上也提高三四倍，上海的现基础较各省要好，但提高的标准也高一些（平均每人总产值要求达到1100元到1300元），也要提高3倍多。这样，“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的条件较好，大约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会议提出，过渡的时间是一个大致的杠子，具体过渡起来，各公社要有先有后，各生产大队过渡条件的成熟程度有早有晚，“条件成熟了不过渡，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生产发展；条件不成熟，勉强过渡，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一般公社的发展趋势，将是分批过渡，成熟一批过渡一批，有些公社，大队情况基本平衡，同时具备了过渡条件的，也可以一起过渡。”

为了创造条件过渡，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发展社有经济，特别是社办工业，实现公社工业化，要求采取措施扶持穷队翻身（上海打算在1960年基本达到，江苏打算在1962年基本达到）。

1960年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阐明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的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就实现社基本所有制的条件来说，第一，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人年平均收入150元至200元的水平；第二，社有经济部分在全社经济中占有优势；第三，穷队赶上了富队；第四，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程度。”

根据这种精神，各省开始了试点。为了快一些发展社有经济，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各种“大办”一齐上；为了扶持穷队赶富队，在资金劳力、生产资料等方面搞“共产主义大协作”，“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平调的范围很广，土地、房屋、粮食、生产工具、劳力、家具等无所不有，搞平调的单位，有的上至省市，下至小队，而以公社为多。共产风的重新刮起，使农业生产严重受损，社员的处境雪上加霜。一些地方大批人员浮肿——死亡——外逃。

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在继续“大跃进”和重新部署过渡时，强化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就成了必然的做法。

公共食堂何以成了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

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产生和推广的。它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大跃进”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当时认为，办公共食堂可以解放大批劳动力投身于“大跃进”，公共食堂实现了“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正是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生事物。因此，它一诞生，就备受青睐。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和“大跃进”的需要，指示“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社员吃得饱，吃得好”。

但是，严重的“五风”使得农民生活处于困难境地，食堂难以维持。第二次郑州会议解决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后，中央便着手解决公共食堂问题。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指示：“要通过夏收，认真地整顿食堂。”强调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既要使参加食堂的社员真正自愿，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食堂一风吹散。”办法比过去也灵活了一些，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范围过大的，可以适当缩小。特别是：“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食用。”与此相适应，中央还指示分配给社员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私人喂养猪、羊、鸡、鸭、鹅、兔等。

口粮分配到户的口一开，农民们宁愿回到家里做饭、吃饭，而不愿继续在食堂吃饭。山西省参加公共食堂的人数“一度剩下的不到农村户口的20%”。有的人主张“家家起火，户户冒烟，拆散食堂，重建私灶”。有的食堂散伙了。甚至还出现过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事，他提出“三还原、两开

放”（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体所有的渔塘开放），亲自帮助农民拆掉公共食堂的锅灶。该县共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

庐山会议上，公共食堂问题成为分歧的主要问题之一。彭德怀、周小舟等提出了异议，张闻天说得更直截了当：“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接连对公共食堂问题写批语，批评解散食堂是“悲观主义思潮”，“是腐蚀党的，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说解散无为县食堂的张恺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国际上，中国的公共食堂也是受攻击最多的问题之一。杜勒斯说，“公共食堂破坏家庭”。依据当时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就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公共食堂更增加了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在各地反右倾中，是否坚持参加公共食堂吃饭，就成为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问题！各地纷纷整顿、恢复和普及公共食堂。

此时，由于1959年冬春的灾荒，许多农村公共食堂已难以为继，有的已经断粮断炊。有的已发生死人和外逃现象。

1960年2月16日至18日，贵州省委召集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会后向中央报告了全省13万个食堂80%是巩固的、20%左右是



北京海淀人民公社青龙桥工作站第一连食堂的社员在吃饭

不巩固的情况，以及整顿食堂的措施。省委报告反映：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的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主要原因：一是基层组织有问题，有的被富裕中农把持，千方百计拖垮食堂，挖人民公社的墙脚。二是实际工作抓得不紧、不具体、不切实，听任食堂涣散下去。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不固定、不巩固的食堂立即加以整顿。省委的报告提出：“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扯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并提出了把社员自留地转交给食堂的问题。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的报告，并将口粮分配的原则改为“指标到户，实物到人，凭票吃饭，节约归己”。

毛泽东进一步指示道：贵州省委的报告写得很好，各地要“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并说，这篇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毛泽东以很大的热情关注着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

3月5日，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向中央汇报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经验。毛泽东在汇报记录上即兴写下了几句话：

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帐，明明白白，帐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

3月15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文件，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批示。批示说抓食堂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要求各地“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毛泽东写道：“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争

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但其他各省、市、区，暂时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也不要勉强，两三年内争取逐渐达到，是可以的。”

执行中央的指示，到1960年4月，据14个省市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人数占总人数的88.6%，河南省达99%。对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阵地”的坚持，大大加重了农村的灾难。

城市人民公社“应一律挂牌，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1960年的“大跃进”还有一个新插曲，即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没有对城市提出要求。但在公社化浪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少数城市一些居民自发地成立了人民公社。其性质类似社区服务性组织。

1958年11~12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正式提出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决议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会成为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

不过，此时中央的态度较为谨慎，考虑到城市与农村的诸种差别。《决议》要求“在城市中应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然而，1960年初，在反右倾，“大跃进”的口号下，城市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1960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拟发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稿上批示：

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想通过兴办城市人民公社再一次地振奋一下人心。中央指示稿中有一段话：

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也不要在一个时期满街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过去已经挂上者不取消）。但是一切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

都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去进行。

毛泽东显然感到没讲够。在后边加了几句话：

慢慢挂上公社牌子则是可以的。除这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1960年2月，贵阳市区某街道庆祝城市人民公社成立

他继续批示说：

最好有一位书记专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各城市应派一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等处去参观那里的人民公社。^①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这表明，中央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主张稳妥试验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批示》表现了一种想大干一场又难卜前景的心境，如，一方面肯定已经办的城市人民公社“都表现了它们的优越性”，能够大大改变城市的面貌，广大劳动人民的家庭妇女，对此有极大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承认“生活比较富裕的上层家庭的男女成员，则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城市人民公社有不少的顾虑。”《指示》提出“今年一年内，城市人民公社还在试办阶段，各地报纸可以登载组织街道生产、组织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的消息以外，关于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消息都不要登报，也不要组织群众性的庆祝游行。”

上述指示还比较谨慎，然而到了3月3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乐观地认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54～55页。

为正在全国城市中大力兴办的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事实已经证明，城市人民公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它的成长将是我们实现1960年以及今后的继续跃进的一个新的重大的积极因素。”

从4月1日开始到4月8日，新华社接连发表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中央和各地主要报刊都迅速转发了这些消息。这就大大突破了中央3月9日批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不要登报的精神。

4月9日，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度的发展，而且还是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工具，并表示，大城市也必须逐步分批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

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以后，在全国迅猛地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兴办城市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据统计，截至1960年5月10日，在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6900万人口中，已建立人民公社1039个，入社人口达3900万余，占全部城市人口的55.6%。公社兴办的工业生产单位达9万多个，兴建的服务站达10万多个，公共食堂9.2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达9.5万多个。

然而，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原有工矿企业和街道组织之上，叠床架屋，再建人民公社，更显得滑稽可笑。而且，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其来势汹汹，却生不逢时，此时，“大跃进”已是强弩之末，后果日益暴露，1960年下半年中央工作的重点转入应付危机。城市人民公社也成虎头蛇尾。已有的公社组织，一部分即“逐渐解体，自行消亡”。由于命运短暂，以至今天人们很少有人谈及它。

“挂甲”元帅对时局的看法

正当“大跃进”的热浪再次席卷中国时，有一个人怀着焦灼的心情发出感叹：“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正这个错误”。

这个人就是遭受错误批判、离群索居、“闭门思过”的彭德怀元帅。

1959年9月30日，建国10周年庆典前夕，彭德怀举家迁出中南海永福堂，